
绥远抗战述论

余子道

绥远抗战发生在中国由局部抗战向着全国抗战的过渡阶段，是局部抗战中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一役。毛泽东当时就高度评价绥远抗战的意义，指出这次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① 绥远抗战的胜利，留给了后人许多深刻的教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一 日本对内蒙西部的扩张和侵略

绥远抗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激化，南京政府转向抗日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以晋绥地方实力派为主进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一次民族自卫战争。

绥远的危机日甚一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侵略扩张政策造成的。绥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省，其地域在内蒙古西部。侵占包括绥远在内的内蒙古广大地域，早已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满蒙积极政策”的重要目标。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之后，夺占绥远遂被列入其直接的行动计划之内。

日本大致把侵占内蒙的计划分为三步。第一步，占领内蒙东部地区，把它纳入伪“满洲国”的领域之内。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事

^① 转引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08页。

变,这一步侵略计划已得到实现。内蒙东部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步,在内蒙西部地区煽动和制造所谓“内蒙自治运动”,利用内蒙封建上层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分裂主义,把这一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察哈尔省的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旗、绥远省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等盟旗,乃成为这一步的主要目标。第三步,以内蒙古西部地区为领域,建立一个所谓“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这最后一步,是以鼓吹“大蒙古主义”作为笼络内蒙古王公们的诱饵,但始终未能实现。日本军方道出了它对内蒙的真正企图:“对西部内蒙开展工作”,“其目的在于使……西部内蒙古民族投靠日满,并阻止与中国共产军及苏联势力范围的外蒙古联系,并在确保满洲国治安的同时,对外蒙古采取怀柔政策,以利于我对苏的作战准备”。^①而实际上,自长城抗战结束以后,日本侵略的步骤,是从热河向西推进,企图席卷察哈尔和绥远,控制这一贯通华北和西北、联结内蒙与外蒙的战略中间地带,以达到向南威胁河北、山西,向西震撼陕西、宁夏、甘肃,向北对付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目的。

日本实施对内蒙侵略的主角为关东军,它把这一侵略扩张活动称为“内蒙工作”。《塘沽协定》成立后,关东军“内蒙工作”的重点,已从“经营东蒙”转移到“进窥西蒙”。当时担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回忆:1933年以后,日本“对华北工作分为两项,一是内蒙工作,二是华北工作,其目的就是在这些地区排除敌视‘满洲国’的政权,而建立友好的政权”,因为“内蒙古在东亚大局中占一重要地位。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的利害交叉点”。^②关东军侵夺内蒙西部地区,主要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两项方法。在1933—1935年,主要是从幕后操纵和指使内

① [日]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2页。

② [日]重光葵:《昭和的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日本侵华内幕》,第87、90页。

蒙一部分王公进行所谓“内蒙自治”，并配合以军事进攻；到1936年，则主要是指伪蒙军举行武装进攻，并辅之以政治上的谋略活动。

关东军在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支持下，一步紧接一步地策动分裂和入侵内蒙西部察、绥两省的活动。还在长城抗战之时，日军和伪军就侵占了察哈尔东部重镇多伦。1933年4月，关东军策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浩济特旗、阿巴嘎旗及外蒙车臣汗部，于热河赤峰召开所谓“内蒙王族大会”，宣布脱离中国，与伪满洲国合流。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等还企图策动察绥分离，建立一个与“满洲国”同等的“蒙古国”。^①

关东军“内蒙工作”的主要策略，在于充分利用蒙伪势力、民族分裂分子和流窜于各盟旗的匪帮，组织傀儡政权。其具体做法是“将德王的政治和李守信的军事，卓特巴扎普总管的保安长官，在察哈尔省长城以北结成一体”^②，作为推进“内蒙工作”的主要杠杆。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代理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于1933年夏发动了“内蒙自治”运动，要求“组织内蒙古自治政府”。关东军竭力利用他进行民族分裂、树立傀儡政权的活动，煽动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等人都到过苏尼特右旗，煽动成立“蒙古国”。^③

关东军同时操纵几股伪军向察、绥进犯。1933年8月，李守信部伪军攻占多伦，9月关东军的多伦设立“察东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公署”，李守信任行政长官。察东伪政权的建立，为日伪军进犯内蒙筑起了一座桥头堡。1934年底至1935年1月，日军挑起察东事件，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到自沽源到独石口一线的以南、以西地带，

① [日]《现代史资料(八)》(《日中战争》)，文求堂书房1963年版，第449—463页。

②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3年中文版，第126页。

③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页。

1935年5月,关东军又制造张北事件,于6月逼迫中国察哈尔当局签订《秦土协定》。中国军队驻扎张北以外的部队,从此全部撤出察哈尔省境。从河北、山西经张家口通向内蒙和外蒙的通道由此被切断了。

日本在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又加紧了推行“内蒙独立”计划,并准备以武力进占察北、绥东地区。1935年7月,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施策要领》,提出了一个全面入侵和控制内蒙西部的计划,其中规定:“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①日军把直接进犯的目标指向察哈尔。同年12月,关东军指挥李守信部先后攻占宝昌、沽源和康保、张北、化德、商都等县,制造了“察东六郡事变”。至此,察哈尔省的绝大部分疆土沦于关东军及其操纵的伪军铁蹄之下。1936年2月1日,在关东军驻张北特务机关的直接操纵下,察境傀儡政权“察哈尔盟公署”在张北成立。接着,关东军谋求树立内蒙地区的“统一”政权,于同年2月12日在德王府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12日,内蒙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县(嘉卜寺)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在中国扶植的又一个地区性傀儡政权。

这以后,日本侵略者遂将侵夺内蒙的重点指向绥远。在《对内蒙施策要领》中,已确定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并用夺占绥远的计划。它提出:“对于绥远省的傅作义军,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如果可能,或者先行收买,努力使其行动符合于关东军的意图”;“但如果认为无论如何难以实现(收买)时,就抓住有利时机,把他(傅作义)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②于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太原特务机关长松室孝

① 关东军参谋部:《对内蒙施策要领》,《现代史资料(八)》(日中战争),第492—494页。

② 关东军参谋部:《对内蒙施策要领》,《现代史资料(八)》(日中战争),第494页。

良、和知鹰二等人，纷纷窜到归绥，对绥远当局进行威逼利诱，力图策反傅作义步德王之后尘，并声言如果不按日方要求行事，则日本将“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绥远问题。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也直接参与入侵绥远的活动。1936年1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定的《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规定：“对绥远省南部及宁夏方面之施策，鉴于与华北工作之关系，主要由中国驻屯军担任之”，张垣、绥远两个特务机关划归华北驻屯军管辖。^①同年8月，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集太原、归绥、张垣等地特务机关长和北平、塘沽等地驻军头目，讨论如何加强对绥远的渗透活动。于是，绥远的危机空前严重化了。

二 绥远抗战格局的形成

日益紧张的绥远局势，引起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中国中央政府和晋绥地方当局也对日伪军肢解绥远发生极大的震动。

蒋介石这时虽然尚未从根本上抛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日本无休止的侵略和扩张，不再采取一味退让的态度，而是主张实行有限度的积极的抵抗，同时也为大规模抗战进行着若干准备。他正从对日不抵抗向着抗战方向发生转变。他虽然正在调动军队进攻经过长征进入西北的工农红军，但对日伪军入侵绥远，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对策。

1936年春，蒋介石派中央军五个师入晋，同年6月在太原成立“晋绥陕甘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这是蒋介石为“围剿”红军和将南京中央势力楔入晋绥地区的一大举措，同时也是为了对付日伪军入侵绥远、山西而采取的一个准备。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决定调中央军三个师增援绥远。同月

① 《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6页。

21日,蒋在致阎电中指出绥远之战必不可免,说:正在南京进行的中日“谈判仍无进展,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① 他向阎提出绥远作战方针的意见:“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② 蒋还公开向报界表明保卫绥远的决心。10月28日,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日谈判中方“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对于华北问题,“河北省内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东匪祸之取缔,在我方尤为必要”。^③ 蒋介石对绥远作战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当时仍然以主力进攻红军,并未决策对日全面开战。他曾致电阎锡山:“击破匪军之后,追击不必过远,至绥察边境即可停止,或追击到察边后即行退回绥境原防。”^④ 这说明蒋的绥战方针有积极保卫绥远的一面,但其绥战构想并未超越《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张松协定》所规定的界限,乃为一种有限度的局部抗战之政策。

当时,中日“调整国交”的谈判正在南京举行,绥远问题为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9月23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谈判中,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提出的七项要求中第一项即为将绥远、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五省划为所谓“缓冲区域”,把军事、政治、经济等大权“移交”由日本操纵的“自治政府”。张群明确回答:日本在华北“欲造成独立或半独立之政权,则此种计划,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商讨之余地”。^⑤ 他提出中国的五项要求,其中第五项是“解散察东与绥北匪军(蒙古德王及李守信部队)”,并指

①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77页。

② 同上,第678页。

③ 《国闻周报》,第13卷第44期。

④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8页。

⑤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73年版,第64页。

出：五项问题是目前两国纠纷的症结所在，若不能解决，则中日邦交无从调整。^① 蒋介石继 10 月 28 日公开宣布中日谈判中必须坚持取缔绥东、察北之伪军的要求，又于 11 月 10 日致电张群，规定对日谈判“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否则，“虽至任何牺牲，亦所不恤”。^② 这些均表现了蒋氏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以阎锡山为首的太原绥靖公署对绥远局势的对策具有重要作用。阎既有对日妥协的一面，又有要求抗击外来势力入侵的一面，而保护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不受损害，则是其政策的基轴。日军魔爪西伸绥远、覬覦山西，这对阎已构成了严重威胁，他深知如果绥远不保，山西决难苟安，因而要求对侵犯绥远之敌予以抗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也对阎有影响。毛泽东曾致函阎锡山，提出中共“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联合一致，抗日反蒋”。^③ 同年 10 月，中共派出薄一波等人，接受阎的邀请到太原协助从事抗战准备。薄一波负责山西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工作，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阎的对日态度也有了变化，提出了“守土抗战”的主张。他认为：“恢复失地，固非当时之力所能胜，而守土抗战则为军人应尽之天职”，主张“抱着弱国的态势，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强自强的方针。”^④ “守土抗战”尽管含有守土自保的消极性质，但比之不抵抗政策却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绥远既是晋系的势力范围，按“守土抗战”政策自是必须守卫的。于是，阎锡山同意并支持傅作义举行保卫绥远之战。

①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第 68 页。

② 《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 年 11 月 10 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 680 页。

③ 毛泽东：《致阎锡山》（1936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35 页。

④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6 页。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在这一事变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晋系高级将领,自1931年以来主持绥省军政多年,已形成相对自主的地位,但仍受太原绥靖公署的节制和指挥。傅作义本人富有爱国精神,一向主张抗击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在长城抗战中曾率领所部英勇作战。1936年8月和10月,毛泽东两次致函傅作义呼吁联合抗日,说:“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①这也对傅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曾毫不动摇地拒绝了来自日方的多次利诱和威胁,坚持严正的民族立场。而日本关东军的日益进逼,德王在日军支持下的得寸进尺,也不能不使傅作义奋起反击,否则绥远必将蹈东北四省之覆辙。但他深知,如不得到南京和太原当局的支援,绥军将陷于孤军苦战,难有决胜之把握。从1936年初以来,绥远当局从各方面进行动员和部署,作好抗战的准备,同时不断向蒋介石、阎锡山要求支援。傅作义的积极抗战的态度和实际准备,为绥远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绥远抗战格局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和晋绥军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而傅作义绥远当局在其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蒋介石南京当局则支持这次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份。这一抗战格局所确定的目标是有限度的,它要求消灭入侵绥远之敌,肃清绥远境内的日伪据点,虽然曾计划进攻商都和张北,但并未要求对盘踞察哈尔和河北的日伪军全面开战,所以仍然是一次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全国一切主张抗战的党派团体以及广大民众,热烈支持绥远抗战,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援绥运动,与前线的武装抗日互相呼应互相激荡。

^① 毛泽东:《致傅作义》(1936年8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页。

三 首战红格尔图

绥远抗战的第一个战役是红格尔图之战，而察绥边境三堡沟的战斗，首先揭开了这次抗战的序幕。1936年6月，由伪蒙政府指使的伪“边防自治军”在张北、兴和交界之三堡沟逼近绥边。7月1日，绥军发起夜袭，将该敌一举歼灭，胜利揭开了绥远抗战的序幕。

这时，晋绥当局判明敌将大举进攻，乃决定进行全面作战部署。阎锡山决定以晋军第十九军、第六十八师、独立第七旅和第八旅、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参战部队。10月12日，中央军第十三军及骑兵第七师奉令入绥作战。绥军第三十五军为傅部主力，全军进入战备。10月24日，傅作义赴太原，向阎锡山请示有关作战问题。阎同意将驻在绥远的赵承绶部、王靖国部及驻雁北的李服膺部归傅指挥，会同绥军进行抗战。同月30日，阎与傅同赴洛阳，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傅作义分析了日军和伪蒙军在绥东的军事部署和侵略企图，强烈地表明了自己抗敌的决心和要求。蒋同意傅的请求，支持他“不卑不亢，相机应付”，并允准将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和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归晋绥方面指挥，并同意南京空军参加绥远抗战。^① 阎、傅返回太原后，蒋于11月2日电示阎：“对进驻百灵庙部队之准备与时期，请详计密示，以备对德王下令。”^② 这也表明了攻占百灵庙的决心。

11月4日，傅作义由太原返回归绥，即会同赵承绶赴前线检查战备。绥远参战部队主力，由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和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

这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尚未决定对绥远用兵，仍主张暂以政治渗透为手段，曾向关东军指示：“对内蒙工作范围，大体上限

① 《傅作义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5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②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2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制在长城一线以北,且不使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之地域。”^①但关东军急于攻占绥远,又判断中国军队决不会抵抗,乃在未得东京军部同意的情况下,指挥伪蒙军和其他伪军发起对绥远的进攻。攻绥敌军是以德王和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古军为主力的两个军、七个师组成,另外还有以王英为总司令的“大汉义军”四个旅。

田中隆吉与德王、李守信、王英等 11 月 5 日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首先以李守信、王英两部分兵三路进攻绥远。伪军出动的总兵力约为 2 万余人。^②其作战部署,是以商都和百灵庙为据点,对绥军取外线包围态势,以便南袭归绥,攻取包头、固阳,西攫五原、临河,迫使绥军退守山西。

敌军进攻战的第一仗,选择在红格尔图,该处为绥察交界之要冲。绥军驻兵,不过骑兵两个连,人数 200 余人。这个小镇人口不过千余,但却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又与百灵庙、大庙(锡拉木楞庙)连成犄角之势。它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成为日伪由察边西侵绥远的必争之地。敌军目的在于从此打开绥东门户,然后三路进兵,会师归绥,进而占领绥远。

11 月 8 日,傅作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绥东一带防务由彭毓斌、董其武两部负责;绥北一带防务,由孙长胜、孙兰峰两部负责;绥西一带防务,由王靖国部负责。13 日,傅作义、赵承绶与新任绥东保安司令董其武齐集集宁,同彭毓斌等会商作战部署问题。傅作义指出:“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③

11 月 14 日上午,王英伪军主力从商都倾巢而出,全力西犯。15 日,王英部 1500 余人开始向红格尔图猛攻,标志着对绥远大举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 287 页。

② 《傅作义致阎锡山电》(1936 年 11 月 7 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6 期。

③ 董其武:《戎马春秋》,第 91 页。

进攻的开始。

傅作义、赵承绶于15日半夜到达集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他们分析：敌主力所在方向，不在兴和，也不在百灵庙，而在于商都，其企图是待王英攻红格尔图得手，即南犯平地泉；进犯红格尔图之王英伪军，部队庞大，挟其优势围攻我红格尔图的孤军。如敌得手，则可增长伪军的气势，威胁绥省之民众，影响我军之士气；并有可能西出绥西，形成对我军的严重危害。因此，对王英伪军“若不急于扑灭，使其任意活动，确最危害于我”。^①

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四个团，由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领步兵两个团及炮兵一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

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约有三四千人，除一部围攻红格尔图，其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等处。18日凌晨2时，董其武率所部对集结在土城子、打拉村一带之日伪军进行分割包围，分别予以聚歼；同时令骑兵团秘密迂回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②18日凌晨，我军发起全线进攻。土城子以北、东西山腰均被我步兵攻占。红格尔图之敌残部被迫向北方逃窜，南面之敌亦由东面向北绕道而撤。上午8时许，我骑一师师部胜利进入红格尔图镇，红格尔图保卫战宣告结束。此役共毙敌军500余名，俘敌20余名，连同保卫战前三天之战，共毙敌1000余名。^③

红格尔图之战规模不大，但我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全国民众闻声雀跃，援绥运动由此勃发。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投入援绥活动。至同月24日，仅上海一地，民众捐款已达50万元。天津

①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纪》，《军事杂志》第100期。

② 董其武：《戎马春秋》，第93页。

③ 红格尔图战斗之战果，据董其武《戎马春秋》一书记载，“是役共毙伤敌伪军1700余人，俘虏伪军300余名”；本文系采用傅作义在当时发表的《绥战经过详纪》一文之数字。

《大公报》馆从11月16日起公开宣布接受各界民众援绥捐款,前来捐款者不绝于途,每日收款达三四千元,24日一天高达5711元。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组成战区服务团,开赴前线从事战地工作。南京与太原当局在全国一片援绥呼声中,亦表明自己的态度。17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太原,同晋方高层人员会商绥战有关问题。阎锡山公开表示:“为争民族生存,保国家领土,已抱最大决心,并不惜任何牺牲,与敌奋斗。”^①

红格尔图之战获胜的当晚,傅作义即决心乘红格尔图初战告捷之声威,敌一时难以集结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② 于是,进攻百灵庙之战就开始了。

四 百灵庙战役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内蒙古西部的重镇。当时,德王控制百灵庙于自己势力之下,“近则以该地为中心,对绥蒙人士,威胁利诱,愚弄离间,以潜移默转其内向之心,远则以该地为根据,向西北延伸其政治侵略,期遂其蚕食鲸吞之欲”。^③ 田中隆吉和德王以为百灵庙名义上仍隶属于南京政府,绥军不会进攻该地;而这里又距包头较近,可以随时发兵攻略,因此,他们既把百灵庙作为进行绥远战争的后方基地,又将它视为尔后进攻包头的前进基点。此时,驻百灵庙的敌方兵力约有3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

① 《大公报》,1936年11月18日。

②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16日),秦孝仪编《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湾正中书局1985年版,第422页。

③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纪》,《军事杂志》第101期。

进攻百灵庙是由蒋介石、阎锡山、傅作义共同商定的。在10月下旬洛阳会议时，傅作义已提出攻占百灵庙之意向，蒋介石在原则上表示同意。11月2日，蒋自洛阳电询阎锡山：“对进驻百灵庙部队之准备与时期，请详计密示”，并嘱阎“就近精研轻重之势，斟酌利害得失”。^①此时阎锡山对于进攻百灵庙尚有疑虑，在给蒋的复电中说，如向百灵庙进攻，“德王或即宣布独立，藉日军抗战，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目战争之虑，利害亦关重要”。^②他担心此战会引发对日军直接开战。但傅作义的态度却要坚决得多，他在同月15日主动向阎锡山提出“奇袭百灵庙”的建议，说敌进攻红格尔图，“战端既开，我应换得主动或机先制胜之势，对百灵庙似应奇袭解决，以除后患。且必要时，对商都亦应相机攻下，打破敌之企图。”^③阎在复电中同意攻夺百灵庙，但表示只有在有了详密计划、中央军汤恩伯军和门炳岳师全部集中，并得蒋介石复电后，方可“相机办理”。

蒋介石在洛阳接到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请示电报后，即于16日复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④为打消阎在外交上的顾虑，张群和蒋介石还分别从南京和洛阳致电阎锡山，根据日本国内动向，指出：“彼方外、海两省均无意决裂，军部亦无全面决裂痕迹，一般对绥东发动不赞成……观察现状，难有大举。”^⑤蒋认为关东军不可能直接参战，要阎速下决心。他在19日致阎电中，强调进攻百灵庙“我军出击日期愈快愈好”。^⑥阎这才最后决定进攻百灵庙。

晋绥军此战的意图是要同时达到“歼灭敌军”和“收复百灵庙”

①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2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② 《阎锡山致蒋介石电》（1936年11月3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③ 《傅作义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15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④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16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⑤ 《张群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22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⑥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11月19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这两个目的。傅作义在《收复百灵庙之机密作战计划》中,对作战方针、袭击方式、兵力配置、战术指导及战后处置等各项重要原则,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11月20日,傅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及袁庆荣,部署作战事宜,要求在24日前“以最速疾动作,敏快手段,于增援之敌到庙以前,袭取成功,期能各个灭敌”。^①当晚,孙长胜、孙兰峰等驰赴武川,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也进驻武川指挥作战。

23日下午,我进击部队发起攻击,夜10时,中央纵队进抵敌蒙古营盘前沿,打响了进攻百灵庙之战的第一枪。24日凌晨,环绕百灵庙的山丘之内,敌我两军展开全面激战。经反复冲杀,我军于9时30分攻占了敌全部阵地,百灵庙之战胜利结束。

关东军在伪蒙军百灵庙惨败后,准备迅速调动驻东北和热河一带的日本陆军入绥直接参战,但与东京陆军中央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关东军的出兵计划未能实现。^②

百灵庙一役,“伪军伤亡七八百人,(被)俘300余人,(绥军)夺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支、电台3架”^③,还缴获弹药一批,面粉2万余袋和大量汽油。我军以伤亡官兵3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战役的全胜。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一举摧毁了日伪军在内蒙古西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地,从而拔掉了日伪侵略势力楔入绥远北部的一颗钉子,对敌人西侵绥远、宁夏,南下山西、河北的计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此,傅作义当时论述说:“敌人在长城以北,从察哈尔东边多伦起,经过张北、商都、百灵庙,迤西经过阿拉善而达青海直北之额济纳为止,划成一条联络线……而百灵庙位置在全线的中部,给我打下以后,东西两方便没法联络起来。这一仗关系很大。”^④

①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纪》,《军事杂志》第101期。

② 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88—291页。

③ 《傅作义致蒋介石电》(1936年11月24日),《绥远抗战实录》,第6页。

④ 转引黄炎培:《绥远劳军一瞥》,《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47期。

百灵庙大捷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国抗日阵线的形成。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于24日当天传出,各地报纸竞相发出“号外”。全国军民群情激昂,欢欣鼓舞。各界人士的抗日援绥活动汇成新的高潮。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西安等大中城市的救亡团体,陆续派出代表赴前方慰问。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也起而热烈响应,纷纷请缨抗战。全国援绥运动波澜壮阔,动员面很是广泛,持续时间也久,直至西安事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许多地方捐款捐物,各种声援活动仍在继续。

百灵庙大捷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也趋向强硬。百灵庙战役结束的当日,南京政府即致电德王,斥责其轻启战祸,并指出百灵庙为绥远蒙政会所属区域,应遵前令,一律迁出。11月27日,关东军就绥远战争发表宣言,说什么伪蒙军进攻绥远,“其目的与日满两国之国策一致,故关东军对于内蒙军之行动,为极大之关心,而愿其成功”。“万一满洲国之接壤地受此战乱之影响……则关东军将不得不采取适当之处置。”^①对此,南京外交部于次日以谈话形式发表声明,针锋相对地指出:“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论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备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干涉或侵犯。”^②蒋介石和陈诚也于29日分别在洛阳、归绥发表谈话,高度赞扬收复百灵庙之战,指出绥远为我国防前线,凡有危害我国国家民族,与希图破坏我国国家土地之完整者,不论是谁,皆必当予以铲除,决不姑息。

① 《关东军宣言》,《国闻周报》,第13卷第48期。

② 《外交部发表谈话》,《国闻周报》,第13卷第48期。

五 锡拉木楞庙之战

百灵庙为军事政治要地,日伪数年来经营该地,耗费了巨量的金钱和心血。我军收复百灵庙后,日军的全盘企图与既定政策遭受严重挫折,自不会甘心。11月29日,田中隆吉和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实行反攻,“以大庙为基地,夺回百灵庙”。^①绥军早已预料到敌必反攻,并预先作了对应部署。11月28日,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即在归绥会商,针对敌之企图,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当即“策定将敌遮断,各个解决之方略”,即将王英伪军和大庙之敌加以分隔,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以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目的。

按照预定计划,攻占百灵庙的绥军,除留一小部驻守庙区,修补工事,对敌警戒外,其余主力于24日下午3时悉数撤回集结地二分子镇一带待命。伪军随即发起对百灵庙的反攻。12月2日晚,敌以装甲车10辆为前导,以汽车载兵千余人从大庙出发,3日凌晨窜到百灵庙附近。田中隆吉派出飞机7架,轰炸百灵庙阵地。我军按预定部署,经过二十几个小时战斗,至4日上午4时余,毙敌“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军的反攻。经此一战,王英伪军主力遭到严重打击,为绥军发起攻占锡拉木楞庙的战斗铺平了道路,成为锡拉木楞庙的序战。

锡拉木楞庙在百灵庙东面70余里,位于四子王旗北部。德王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战斗遭到惨败后,残部退回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两地休整。王英伪军残余溃兵也退回锡拉木楞庙。这时,德王为了保存其蒙军实力,不愿其基本武力第七师与王英伪军同驻一处,特电令将伪七师驻锡拉木楞庙的部队调往布拉图庙集中。但德王的这个命令当即遭到王英伪军和日本顾问的强烈反对,伪

^①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日本河出书房1957年9月版,第117页。

七师所派的岗哨和警戒部队全部被撤下，改换王英伪军接防。于是，伪军金宪章部担任了锡拉木楞庙的防务，石玉山部负责庙南30里的哈拉伊力根的警戒。伪军内部争斗的激化，对绥军进攻锡拉木楞庙很有利。

这时，金宪章和石玉山均分别派人秘密向傅作义部接洽投诚。由于绥远当局早在开战前已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卓有成效地开展对伪军的策反工作，又对投诚伪军立有适当的政策，伪军阵前倒戈的时机已趋成熟。至此，攻占锡拉木楞庙的战机终于到来了。

12月6日，晋绥军对伪军王英所部发动了进攻。8日，我军包围了石玉山部驻地哈拉伊力根。经过联络，石部当即宣布在阵前反正。10日，金宪章部也正式宣告投诚，其突击队100多人还攻入日本顾问区，将小滨以下日本军官27人悉数击毙砍杀。12月19日上午，我军进占锡拉木楞庙。伪军纷纷向我军投诚，有的伪军甚至不待赴归绥联系投诚的代表返回，即与绥军取得联系，宣布反正。王英被迫带着残余部队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百灵庙和锡拉木楞庙的攻克，造成了绥远前线的有利形势，为进一步攻击伪蒙军，收复察东失地开辟了胜利的通道。

蒋介石在红格尔图战役之前，还未作出进入察哈尔省收复商都等地的作战企图，只规定晋绥军追击至察边后即行退回绥境。至11月中旬，傅作义首先提出攻占商都的主张，这时蒋介石已判明关东军不会直接参战，指令阎锡山在克复百灵庙后进攻商都。但阎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担心进攻商都、张北，“在我国防设备未完成之前，恐惹起中、日两国正式战争”。他认为：“此时但能予蒙伪军以打击，使其不致再犯绥远，此次战事即可结束。”^① 蒋介石在11月25日、26日两次电催阎锡山：“迅速攻占商都、南壕堑二处匪巢，彻

^① 《阎锡山致傅作义电》，（1936年11月24日），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

底摧毁其根据地。”^① 阎一怕惹起中日战争，二怕与宋哲元二十九军行动不一致，三恐补给不足，四忧金融发生危机，迟迟未能决定进攻商都的部署。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旨意，在太原与阎锡山、傅作义进行磋商，终于制定了攻取商都、张北的方案。12月4日，陈诚携此方案飞赴西安，拟于向蒋介石请示后发动攻占商都之战。不久，西安事变爆发，这一计划遂告中止。

绥远抗战的胜利与西安事变的爆发几乎是同时到来的，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中国正在迈向全国抗战的新时期。

绥远抗战在我国局部抗战诸役中，是唯一以胜利而告终的。这次抗战历时5个月，三战三捷，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师又四个旅，击毙操纵伪军的日本顾问30余名，收复了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战略要点多处，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的计划。

同时，绥远抗战又大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向前发展。百灵庙等等战斗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也“使唯武器论、长期准备论、先安内而后能攘外者，都得到了事实的反证”。^② 绥远抗战表明，抗日御侮，团结救亡，正越来越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84年版，第486页。

② 范长江：《绥远抗战》，（《祖国十年》之一），香港《华商报》1941年10月29日。